

徐承祖与晚清外交

XUCHENGZU YU



WANQING WAIJIAO

骆远荣·编著

 江苏大学出版社
JIANGSU UNIVERSITY PRESS

徐承祖与晚清外交

骆远荣·编著



江苏大学出版社
JIANGSU UNIVERSITY PRESS

镇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徐承祖与晚清外交 / 骆远荣编著. — 镇江: 江苏
大学出版社, 2016. 2
ISBN 978-7-5684-0171-5

I. ①徐… II. ①骆… III. ①徐承祖—人物研究②外
交史—中国—清后期 IV. ①K827=52②D8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39006 号

徐承祖与晚清外交

xuchengzu yu wanqing waijiao

编 著/骆远荣

责任编辑/张 平

出版发行/江苏大学出版社

地 址/江苏省镇江市梦溪园巷 30 号(邮编: 212003)

电 话/0511-84446464(传真)

网 址/<http://press.ujs.edu.cn>

排 版/镇江文苑制版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句容市排印厂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开 本/718 mm×1 000 mm 1/16

印 张/22.5

字 数/625 千字

版 次/2016 年 3 月第 1 版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684-0171-5

定 价/7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电话:0511-84440882)



序 言

甲午战前,中国先后派遣驻洋使节计 22 位,徐承祖是较早的一位,也是极具研究价值的一位。截至目前,仅见北京大学戴东阳、上海师范大学张兆敏分别就中日天津条约、中日长崎事件撰写并发表了相关论文,对徐承祖的全面研究国内迄无专书论及。

作为徐承祖的六合同乡人,骆远荣先生有志于这位乡贤前辈的研究,攻坚克难,数年如一日,博采古今中外史籍期刊百余种。但他并没有只满足于编纂一本史料汇编性质的文献资料,而是通过注释,在考据基础上进一步对相关史料进行了挖掘、整理、拓展和延伸,写成《徐承祖与晚清外交》一书,填补了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

本书内容起于中法战争,迄于中日甲午战争,以时间为线索,以事件为中心,以档案、数据为基础,史料翔实、内容丰富、脉络清楚、图文并茂,再现了以中法战争、朝鲜甲申事变、中日两次天津谈判、巨文岛事件、两次“朝俄密约”、金玉钧事件、中日长崎事件等为主要内容的历史画卷,可谓波澜壮阔、跌宕起伏、引人入胜。骆远荣先生运用了统计、对比、田野调查等多种研究方法,吸收借鉴了当代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对中法战争、甲申事变、日本间谍在华活动等方面的考证较为精彩。其中对 1885 年中日《天津专条》及影响该专条形成的因素,以及李鸿章利用“巨文岛事件”契机将中朝关系在外交上做实这方面的考证,尤为突出。本书取得了新的研究发现,实现了相关领域理论研究的突破,如发现徐承祖传世之作《条议存稿》是开启近代中国“文明国家化”并推动中国实现从“天朝”统治向近代国家转型的思想理论著作,也是 1885 年到 1889 年清廷施政的重要依据,得出了对 1885 年中日《天津专条》形成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是英、俄及李鸿章利用“巨文岛事件”进行外交斡旋导致日本“朝鲜独立论”“属邦威胁论”破产,以及 1885 年到 1894 年这十年是中日战略竞赛最珍贵的黄金十年等相关结论。

骆远荣先生还克服重重困难,编纂了徐承祖年谱,对其人生轨迹进行了还原,并对其国家主权思想的发端、发展、特征及影响其形成的因素进行了探究,对徐承祖这个历史人物进行了合理定位。徐承祖是一个民族主义者、爱国主义者,是近代中国国家主权思想理论的开拓者、奠基人,是活跃在 19 世纪

80年代历史舞台上的战略家、外交家,其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思想无不丰富着中国近代化思想宝库,对中国现代化及外交事业发展亦不无裨益。

两年前,骆远荣先生带着相关历史研究方面的问题,到南京来请教我。他执着好学的精神,当时就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本书的问世,对于中国近代史特别是近代外交史、现代化史的研究,功莫大焉,故为之序,以资鼓励,以示祝贺。



2016年2月

(作序者李天石为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目录

绪论	001
电稿	017
光緒十年	019
光緒十二年	050
光緒十二年	083
光緒十三年	125
函稿	139
奏稿	203
諭旨	243
文稿	263
附录	313
徐承祖年譜	349
主要参考文献	351
后记	355



绪 论

他曾推动中国从“天朝”统治向近代国家转型。

——题记

中国近代史上,本书的主人公因处置“长崎事件”“有失国家体面”而遭受清廷打击并被抛弃。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对他客观公正的评价不会因为时隔130年才做出而有所损失。事实上,他跟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之间存在千丝万缕无法割舍的联系。他是第一批奉旨派遣驻洋的使节,是第三届实际到任的驻日本公使(1885年10月5日—1888年1月4日)。更为重要的是,他开启了近代中国“文明国家化”并推动近代中国实现从“天朝”统治向近代国家转型的历史进程,是近代中国国家主权思想理论的开拓者、奠基人。他的名字叫徐承祖,字孙麒,道光进士徐鼐次子,江苏六合人,监生。

一、影响徐承祖国家主权思想形成、发展、完善的因素

徐承祖出生于19世纪40年代,那时的大清帝国仍以“天朝”自居,对国家主权概念并没有明确认知,而在同时期的欧洲各国,国家主权体系早已推广并得到普遍认同,而其建立的时间还要前推两百年。影响徐承祖国家主权思想产生、发展的因素,归纳起来有三个方面:父亲、时代,以及经历、阅历和个人努力等。

(一) 影响其国家主权思想形成、发展的因素

徐氏本是明代勋臣后裔,祖籍上元(今南京市),传居六合南门后,因经商而“资用华腆”,家境富裕,且为乡党所敬重。1788年,因徐承祖祖父徐石麟卷入科考舞弊检举告发案遭受打击,家道随之中落。徐石麟留下的唯一遗产是其门下所培养出的三个进士,徐承祖的父亲徐鼐乃其一。徐鼐^①(1810—1862),字彝舟,1845年进士,翰林院编修,历任福宁、延平二府知府。1874年,32岁的徐承祖借体仁阁大学士祁隽藻之口对父亲进行了评价:“是可分享

^① 鼐,取自《诗经·丝衣》“鼐鼎及鼐”一句。鼎,国之大器。鼐,小鼎、国家栋梁的意思。

徐承祖与晚清外交

林^①、潜邱^②之席者。”徐承祖本可如父所愿，以文学或史学而闻名。1847 年秋，父亲令 5 岁的徐承祖远赴北京，是有让他走科举道路打算的。有道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成年后，徐承祖并未像徐鼐那样，“于书无所不窥，淹贯经史，著述甚丰”。作为政治人物，他的某些品质并非徐鼐所能给予，而只能由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来铸就。

现代心理学研究表明，16 岁以前的经历对一个人一生所起的作用往往是决定性的。有的人幸而生于盛世，有的人却不幸生于离乱之世。打出生起，列强的侵略便为徐承祖的人生道路投下了阴影。徐承祖出生翌日，中英《江宁条约》签订。当时，英国军舰“康威里斯”号的锚泊地——下关，离徐承祖出生地六合不过数十里之遥。该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正遭遇“数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处于命令的地位去决定国际关系”的政治格局发生了逆转，西方列强动用“条约机制”将中国纳入了由它们所主导的“统治范围”，并据此确定了对华不平等关系。条约签订时，六合县仓促招募乡勇数百名，“握刀游于市上”。县城居民纷纷撤离，徐承祖的祖母却执意不肯：“吾老矣，城破则死耳，何乡居为？”为门户计，徐承祖被送至远方。

1847 年到 1853 年，垂髫之年的徐承祖跟随父母在北京三易其所租房为家。期间，每逢春秋佳节，父亲总与祁隽藻、吕贤基、曾国藩、罗惇衍、王茂荫、金鹤清（榜眼）等十余位翰林，共赴大报恩寺后顾炎武祠堂祭拜。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集体宣誓行动一度遭到打击。一次，从顾炎武祠堂出来，途中某阁学对徐鼐说：“君自名士，我不读书，不识有顾先生也。”又一次酒酣论文，徐鼐为要人所忌，朋友私下警戒道：“古来以文得名者，亦以才得祸，东林复社可惧也。”这件事详载于徐鼐自订的《未灰斋主人年谱》中，徐鼐并未妥协。毋庸置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就是打这一时期在徐承祖幼小的心灵中扎根发芽的。20 多年后，纪念父亲时，他仍慨叹道：“名宿如湘乡曾文正公、旌德吕文节公、道州何子贞太史……士大夫翕然宗之。”跟先辈们一样，徐承祖对国家处境的变化有所期待的立场是一贯的，这种立场并未因国难接踵而至有所削弱，反而因不断的刺激而得以巩固并加强，甚至到了“死无二心”的地步。

1858 年春，16 岁的徐承祖跟随父亲二上北京觐见咸丰时，英国军舰驶入大沽口，“杨村事件”发生，英法联军之役爆发。徐父当即上疏，请求速定战守对策。但接下来发生的是，咸丰皇帝外逃，圆明园被烧……列强在中国犯下滔天罪行。《北京条约》《天津条约》《瑷珲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相继签

① 亭林，顾炎武的字。

② 潜邱，汉学家阎若璩的字。

订,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为镇压太平军,清政府还同列强达成了某些共同的利益……而徐承祖的出生地于5年前就连同数千册典籍毁于战火了。

1858年秋,因父亲调任福宁知府之故,徐承祖来到了福建(自淮安清江浦至福建途中,徐承祖得知了六合被太平军攻占的消息,他也因此逃过了一场生死劫难)。寓居福建时,当地书院业已圯坏,学子们数十年不见二十四史、四书五经诸书。数年后,徐承祖又参加了肃清太平军的行动,至此,他被迫放弃了科举,捐官来到中国的南大门——广东。

履政广东时,徐承祖开始通过《海国图志》等书籍了解世界,接受了林则徐、魏源等人“师夷长技”的洋务思想,并结识了中国第一位耶鲁大学毕业生容闳。这一时期,他们提出了一些进步的主张,并强调国家主权,如办理合资汽船公司上,主张经理、职员一概不用洋人;主张禁止教会干涉人民诉讼,防止外力侵入、律法之权被夺取等。虽“位卑未敢忘忧国”,但仅凭这些尚不足以改变这个世界。之后,“天津教案”“马嘉理事件”相继爆发,崇厚奉命代表清政府以“专使”身份赴法国“道歉”……在历经数不清的战乱和屈辱之后,徐承祖对西方的“战舰之精”“机器之利”“富强之术”再也不能不正视了。俄土战争后,1878年6月,因左宗棠保举,徐承祖怀揣梦想,带着屈辱,跟从中国第一任驻美公使陈兰彬踏上“富有”轮船迈出了国门。亲履异土后,他目睹美国的强大,并震惊于中西文明之间业已形成的巨大落差。他惊呼道:

查美国因机器厂甚多,出产丰足,兼有电报、火车转运极速,故立国甫及百年,而庶富已等于欧洲。

驻华盛顿三年间,他对欧美政治、军事、经济、社会进行了全面的观察,并自学英语,认真翻译《英美条约》。通过翻译,他了解到美利坚民族由13个殖民地奋起抗争,经八年抗战,最终摆脱英国殖民统治成为独立、统一、自由的主权国家。尤其是对“分疆”“定界”这部分内容的翻译令他受益匪浅,徐承祖对近代国家主权内涵和外延的认识得到了提高和升华。可以说,翻译活动对他国家主权思想理论的形成与最终完善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自此,徐承祖对国际法、国际政治概念的认识日臻成熟,对国际法、国际政治的把握比国内熟读程朱理学的知识分子更为实际。这一时期,他的思想取得了明显进步,他慨叹国内保守风气麻痹人心的力量,并成为具有全球视野的中国人。

(二) 国家主权思想及其特征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到1876年,列强对中国的压力暂时减轻了。但1881年徐承祖自美国归来时,中国的问题正在形成。1883年12月,法国政府命令海军提督孤拔率军悍然进攻越南红河领域山西、北宁诸省清军驻扎之地并占

徐承祖与晚清外交

领,中法战争爆发。1884年6月,徐承祖第一次上奏时表达了“于此而不筹富强之策以成治内安外之规,为人臣者何能寝馈稍安乎”,主张国家励志图强反对战争的立场。正是通过这道被赞可媲美贾谊《治安策》的奏折,徐承祖就如何建立一个独立、统一、自主的主权国家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并断言,若不自强,列强“再得志东方”,中国必将“势更难制”,后果不堪设想。这种对时局的判断并非隔靴搔痒,而是触及了问题的实质。一年后,中国放弃了越南,继而是缅甸,中国周边的文化圈土崩瓦解。英国的季南说:“这让人想到了1893年以后的某些特点,以及1938年的某些特点。”

这道奏折洋洋万言,分储才、理财、化莠、水陆营制、江海防、洋务、出使七个部分。从篇章结构看,前五个部分的论述在君权、经济主权、对群众的教化、人权和自卫权层面上展开,第七部分阐述的是外交。值得注意的是,与以往洋务专家提法相异,徐承祖不再把培养管驾人才、发展民族工商业、兴筑铁路、兴造火车等视为洋务,而是将其统统纳入内政范畴,并别具匠心单列“洋务二条”作为第六部分,置于内政和外交两个部分之间。

……我国正可乘此形势,求贤才,抚小民,筹饷源,练军实,利器械,办海防,力除旧习,统焕新猷,待时而动,以雪前耻。

……因思欧洲各国,疆域毗连,心怀争利,交涉通商,一有不合,即以兵戎相见,虽我国向以仁义待天下,彼时纵不乘彼豺狼自相蚕食之际遽兴诛讨,然于此时要其改约,凡有损于我者去之,有益于我者增之,彼自不敢不俯首听从。在我仍不失宽大之意,岂非天假我以维新之便乎?

这种谋篇布局并非巧合,而是徐承祖在对列强强加于中国头上的条约机制已严重束缚了中国以独立自由的主权国走向世界的认识基础上做出的刻意安排。这部分的主旨是,针对国内太平天国战乱以来中国国内元气逐渐恢复及国际形势已呈均势的现状,主张实行“天朝”统治向近代主权国家的转变,加速民族建国历史进程,修改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并根据国家和民族利益,抉择战争或和平,根据形势的变化而转变立场,声索国家应得的政治、经济和民族利益,追求在世界上应有的地位。这种对近代国家主权概念内涵和外延的诠释与20世纪后半期美国历史学家帕尔默·科尔顿的相关论述的主旨基本一致。

不难发现,徐承祖对国家主权思想理论的阐述,是按自上而下、由内而外这一逻辑顺序展开的,有“君主立宪”倾向,并呈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寄希望于君主统治,主张君权分立。他开宗明义道:

为政者首在得人。天地之大,一萃才之区耳,不必求备于一人也。

徐承祖请设“储才馆”、请续派留学生,正是为君主统治和分权服务的。他建议通过“京师宜添设轮船水师衙门”的手段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主张将国家军事领导权收归君主,以利于君主对军事的绝对控制,并结束太平天国战乱以来地方武装割据与君主统治分庭抗礼的局面。

查西洋各国,无论君主、民主,其国中大小政事,悉由上下议院会议。

第二,强调法制在确保君权和行政管理体系正常运转过程中的作用,尤其是在赋税、漕政、办理矿务、社会治理、国防建设上的作用,这对中国法制现代化影响深远。

……倘追取无著,即将该总办照诬骗人财例从重加等治罪,庶人心稍平而后来者亦知所警戒。

……倘敢视为具文并不实力办理,或有侵浮等弊,查实即请按以军法,以示警戒。

……遇有征调,虽假期未滿,即行归伍,违者按以军法……

第三,强调人民权利的正当性。《庄子》云:“爱人利物之谓仁。”受父亲“以人为本”儒家思想和西方“天赋人权”思想的双重影响,徐承祖从镇压太平军转而同情人民疾苦,承认了人民权利的正当性,而这正是“君主立宪”的先决条件。孟子曾向梁惠王献策说:“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挾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奏折中,徐承祖提出“裕国必先富民,筹饷尤患病民。富民当自耕种始”“设立存公局^①以裕饷源”“通行洋货,宜急为仿造”“上益国计,下便民生,莫如火车、铁路若也,各省宜渐次兴筑”“五金各矿……如果经理得人,开采有法,实可上裕国课,下利民生”等主张,以及设习艺所、教育人民读小学和论语等相关建议,积极寻求君主和人民之间的合作机制,以自强之实抵御外侮,无疑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虽谋逆者旋俱扑灭,抢劫者多正国法,固由该犯自罹法网,无足深惜。然推其故要,皆无业贫民,为饥寒所迫,既无手艺谋生,又乏资本贸易,虽明知大干国法,犹冀幸免,以图一时温饱,其迹可恶而其情实可悯也。

二、国家主权思想、国际法的应用及外交实践等

徐承祖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并不单体现在提出如何建立一个独立、

^① 存公局,国有银行的意思,系徐承祖自创名词。

统一、自主的主权国家,推动实现“天朝”统治向近代国家转型的历史进程上,还体现在具体的政治实践和外交实践上。

(一) 参加中法战争,援助台湾岛

中法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一场重要的对外战争。这场战争是以清廷利用“谅山—镇南关大捷”这一契机“乘胜即收”而收场的。鲜为人知的是,最终促成光绪皇帝下定决心向法国开战者,正是我们的主人公——徐承祖。1884年8月16日,光绪皇帝向全国发出谕令:

都察院代递候选知府徐承祖奏,法人狡词毁约,挟兵要求,请速定战守,并将应办事宜敬拟八条,开单呈览一折。现在法越一事,和议尚未定局,万一衅自彼开,必须接战。

徐承祖的这道奏折于1884年8月4日写就,并由都察院锡珍、曾纪泽等八名御史联名代奏。必须记得,辛酉政变时,被杀的顾命大臣等也是八名。徐承祖“反战主和”向“以战促和”立场的转变正是在他自己的国家主权思想的指导下实现的。

……且臣再四思维,非如此不足以言战,亦非如此不足以云守,更非如此不能以成和。

……于此而不决战,若将来各国效尤,则办理通商交涉事件,必致更为棘手。

对法军发动的这场战争的正义性,即使抛开民族的立场,从国际法的角度徐承祖也是抱持怀疑态度的。法国既然不宣而战,是完全不适用传统条约的缔结制度的。对侵略者而言,国际法并不足以成为制约其野蛮行径的有效武器,时常被强权所僭越,甚至还不幸成为殖民征伐的凭借工具。但代表道义与理性的近代国际法在西方殖民浪潮中多少还是可以承载落后国家与弱小民族对于伸张正义的些许期待的,与法军近于屠杀的罪恶行径形成了鲜明对比。徐承祖还向光绪皇帝提出了保护外国侨民的五项主张等,如:

……宜将各国旗号样色速行多颁,晓示沿海军民人等务须记认。如见有法国旗号或不挂旗号船只驶行近岸,即行扼守攻击;如见其登岸,不论众寡,即行格杀,赴官领赏。至防法人假用别国旗号窃入海口一节,伊必不敢,缘西例此禁甚严;如有违犯,一经发觉,该国即须与其失和,且有犯万国公法。

中法战争第二阶段,鉴于法国军舰出没于台湾海峡,以及地方督抚主客观诸原因,清军向台湾岛增援工作进展缓慢。10月20日,法国海军提督孤拔更直接宣布自23日起封锁台湾海峡,台湾地区局势恶化。1884年10月,刘

铭传决意弃守基隆。光绪、慈禧多次谕命李鸿章、曾国荃等援助台湾岛。李鸿章称：“该提督亲军太单，台营多不得力，孤悬海外，无法救援，徒为焦急。”曾国荃称：“叠奉拨船之旨，何忍坐视，奈南洋可派只有……三船，然不足当铁甲一炮，盖船小皮薄，易被轰沉。且接仗之船不能装勇，装勇则不能接仗……”

在此情形下，10月29日，徐承祖再次上奏，强调临危不惧并稳定军心。

臣风闻目下有见基隆被据，意欲迁就议和者，未免所见甚小。殊不思现时台湾仅只失去一隅，于台局实无大损。且叠次交战，尚属互有胜负，何必如此荒张？更何可因台湾一岛致误天下大局？

他还提出“以台保台”、雇佣外洋商轮援台似无不便的具体主张，随即得到了慈禧、光绪的响应。同日，光绪皇帝密令直隶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曾国荃、督办军务闽浙总督杨昌濬、两广总督张之洞、督办福建巡抚刘铭传、广东巡抚倪文蔚迅速贯彻执行。正是在徐承祖的建议下，12月29日夜，曾国荃所雇佣的“威利”商轮潜运江南防营六百人，躲过法舰海上封锁，于台湾卑南（今台东）拨勇护饷上岸，台民欢天动地。事实上，之前李鸿章亦曾建议雇佣外洋商轮，但并未取得成功。徐承祖的主张与两广总督张之洞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张之洞说：

……法未宣战，此举显违公法通例，果有此说，务要力争停罢。

雇佣外洋商轮事泄后，英国驻淡水领事弗拉特声称：“9月26日，一艘法国炮舰搜查了从基隆开出的英国船，使这个问题更为严重了。”一位法律官员在写给英国外交部的文件中指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这场战争在法律上是否存在，法律官员们的意见这时并不一致。”

（二）外交实践及相关问题

中国外交走向近代化是以19世纪60年代初总理衙门的设置为标志的，这是顺应国内外形势发展的结果。甲午战前，中国近代外交尚处于摸索阶段的交涉时期。作为驻日公使，徐承祖的外交生涯并非乏善可陈，恰恰相反，他是一位在外交上颇有建树的外交家。

1. “甲申事变”善后交涉。近代史上，对中国觊觎已久的并非日本一国。明治维新后，日本虽国力未充，但仍最具威胁。趁中法战争中国无暇东顾之际，1884年12月4日，一些日本侵略分子阴助中国属邦朝鲜亲日党发动政变，旨在从根本上推翻中国对朝鲜的宗主国地位，建立亲日政权，史称“甲申事变”。政变消息传至日本后，日本朝野上下一片哗然，所谓“膺惩清国”之呼声甚嚣尘上。因料定日后中日之间必有交涉，为保证订约不再吃亏，他积极搜集日本情报。截至1885年3月10日，徐承祖向清廷提供的情报多达20

徐承祖与晚清外交

份。中日天津谈判前一日,4月2日,徐承祖三封信函被递呈御览,占御览文件总数1/3,成为中日谈判期间清廷决策的重要依据。

……此次朝鲜乱党滋事,提督吴兆有等所办并无不合。前据徐承祖电称:“日人欲我惩在朝武弁,断不能曲徇其请。”李鸿章等设法坚拒……

驻日使臣徐承祖函称该国王调集广岛、熊本两镇之兵,预备战事,伊藤来华,随带水陆将弁多人,沿途侦探虚实。

——《光绪政要》

日本特命全权大臣参议伊藤博文和中方全权代表李鸿章在天津谈判期间,徐承祖曾三次致电李鸿章,主张将朝鲜和琉球问题并案处理,表达了捍卫国家主权和尊严的坚定立场。

朝事咎在倭。彼闻谅山失,始遣使来议,意在乘危。今闻法和我军仍备,甚惶悚。可否乘势举议球案?至惩弁、抚恤二节,万难许,请坚持,彼下旗亦无能焉。

2. 警惕、反制日本间谍。明治维新不久,1872年,日本进一步向中国派遣间谍。1878年,日本另行成立了参谋本部,直属日本天皇,主要任务是搜集中国、朝鲜、西伯利亚诸地的情报。根据徐承祖多项报告,1884年这一年,日本派了大量间谍到中国,足迹遍布西北内陆和东南沿海并由地下活动转为公开渗透。期间,徐承祖致函总理衙门,主张对日本间谍实施抓捕。然而,清廷并未采纳徐承祖的建议,实质上等于纵容了间谍活动,以至于多人打入清政府高层。1886年7月、1890年9月,乐善堂和日清贸易研究所先后在汉口和上海成立。日清贸易研究所新生入学不久,川上操六亲临训示,且受到参谋总长陆军大将炽仁亲王的专门接见。据统计,乐善堂和日清贸易研究所共有91人到日本广岛大本营报到。甲午战争爆发后,这些人或充军中翻译,或做军事间谍,或奔赴前线参与作战,或留在参谋本部出谋划策,成为日本侵华战争的急先锋。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被抓获者仅9名。

不仅如此,徐承祖还通过阅读日本报纸、咨询国际友人、雇佣间谍等各种渠道搜集日本情报,内容涉及日本对华政策、战略等。据徐承祖所雇佣日籍谍报人员“朝比奈”报告^①,1885年12月,改内阁制前夕,日本政府举行了秘密会议。这次会议上,日本政府首次明确做出了“非开辟新地,实难自强”的战略选择,并据此定下了扩军备战伺机入侵朝鲜和中国的战略目标。然而,此

^① 详见 P191-193“函稿”十三附件(二)。

函达于慈禧太后等人之手,众人皆未置一词。

甲午战败一个月后,1895年4月23日,大学士徐桐等人上奏条陈时务时,痛斥清廷没有听从徐承祖八年前的忠告而致酿国难^①。

当日伊藤本计,志在多割要地、速许议和,而切切以勿攻京城为言。此议前使臣徐承祖录之,李鸿章等实亲见之。今此虚声,昭然恫喝;倭人之狡诈固不足言,独怪诸臣明知其意,曾不肯一破其谋为不可解也!

3. “长崎事件”(简称“崎案”)善后交涉。“崎案”是北洋水师发展史上一大转折点,也是刺激日本政府发动甲午战争的重要原因之一。1886年8月13日、15日,北洋水师水兵在长崎与日本警察、民众发生了严重的流血冲突,双方死伤80余人,尤以中方为重。“崎案”原为中日两国之间交涉,竟延至半年之久,英、法、德、俄四国均以调停人身份参与其中,扩大为国际纠纷,“殊属意外”。作为中方最高行政代表,交涉伊始,徐承祖便在国际法基础上先发制人,提出了依据法律程序延请西洋律师的主张,这是以“法理”处理国际争端的一次果敢的外交实践。“崎案”中,徐承祖与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外务大臣井上馨、外务省办理公使陆奥宗光争辩于东京,会谈10次。在他的建议下成立的中日长崎联合委员会,1886年9月6日至12月4日,与日本交锋30~40次,并最终为中国打赢了官司,也是晚清政府唯一打赢的一场海外官司。

4. 中日修约。徐承祖是晚清历史上唯一集译约、修约、订约活动于一身的人。1872年,中日《修好条规》签订,中日两国正式建交。但自订约起,日本便没有遵守的打算。1874年,日本入侵台湾岛。1879年,吞琉球,改冲绳。其后,中国国际地位急剧下降,国难接踵而至。1886年5月1日,日本条约改正交涉在外务省秘密进行。本次谈判英、法两国无视日本主权,态度冷淡,较为消极。日本著名在野人士福泽渝吉在《时事新报》上刊登《条约改正敢不足望》一文,以惊醒不知本次谈判的日本国民。为获取更多权益,日本转而将修约矛头指向中国,企图将不平等条约强加给中国。1886年春,日本新任驻华公使盐田三郎屡次到总理衙门请求中日修约。徐承祖认为修订条约“有关国体”,“不可此轻彼重”,抵制日本修约之请。起初,清廷并不同意与日本修约,继而因中日原约载明有十年重修约定,据驻日公使徐承祖函称,日本正与西洋各国一律议改旧约,中国亦未便始终拒之门外,但这并不表示徐承祖对日本妥协。不久,“长崎事件”发生,因日本政府认为北洋舰队到访长崎系“西体中用”炫耀武力向自己施压,加上福泽渝吉等频频著文煽动反华情绪,当时徐

^① 详见 P337-339 附录十二。

徐承祖与晚清外交



010

承祖与日廷谈判十分艰苦,历时8个月,几于断交。期间,徐承祖仍坚持对条约删改、抄覆、批注,并在按语中于通商第二款内加上“彼此人民须遵两国所缔之通商章程”之句,坚决维护了国家主权和利益。基于西方国家修约时“间有一语未明,终启争端”的政治经验,徐承祖这一按语与“近时内外各衙门办理交涉事件每于无可如何之会,隐忍迁就”的消极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5. 东瀛访书。近代史上,中日之间别有一条文化交流通道——“书籍之路”。徐承祖与书之缘,受到家族尤其是父亲的影响。侨寓北京绳匠胡同时,徐鼐时常带年幼的徐承祖逛书市,虽“度支告匱”,经济拮据,“偶遇心仪仍典衣购买”,竟购得数千册之巨,并得隋唐以前碑刻数百之多。出使日本后,徐承祖以公务之便,与部下姚文栋、学者杨守敬等大力收集、记录、刊布国内久佚的珍稀文献,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浓重一笔。

1867年明治维新起,日本“西学兴,而汉籍替”,风气骤变。在西学浪潮冲击下,汉籍在日本遭遇了史无前例的灾难,甚至到了“颇欲废汉学,故家旧藏几于论斤估值”的地步。表面上,日本欧化潮流盛极一时,汉学已不复存在。其实不然,仍见不少学者不为偏风所动,依然勤勤恳恳,多方保护和采访汉籍,进行认真细致的整理编目,为加强中日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森立之等人所撰《经籍访古志》即其代表。1885年2月,徐承祖出资相助,用聚珍版铅印活字摆印付梓问世,并为之序。这部日藏汉籍提要目录,记录了汉籍各书板高、行格、字数、刻工姓名及鉴定版本的依据,以及书的渊源收藏等款项,并与其他版本进行优劣甄别,足资今日学者编辑善本书录参考。《经籍访古志》正文6卷,补遗1卷,共4册。该书著录中国传入古籍362种,日本古抄本180种,日本古刊和朝鲜刊本120种,合计662种,是继《本朝见在书目录》之后,一部重要的日本目录学著作,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日本江户中期以后度藏汉籍善本的保存情况。该书所涉版本上自唐人抄本,下迄清代刊本,尤以宋元古本为多,其中不乏孤本。不仅如此,这部书还推动了我国版本学“书影”专书的创始。徐承祖所刊《经籍访古志》,同年杨守敬所得尤多,并按图索骥,搜集了大量古籍,且陆续有《日本访古志》《留真谱》之刻。《留真谱》影刊了430种善本的篇页。1887年,徐承祖还翻刻了我国宋代重要典籍袁枢所撰《通鉴纪事本末》42卷,其版由徐承祖以高价得自海东澱藩知事稻叶正邦之手。徐承祖为之作跋,由大域成濑温书写。成濑温(1827—1902),字子直,号大域、赐砚堂主人,今静冈县挂川市人,明治时期书法家,以颜体为宗,曾奉敕书王羲之《集字圣教序》,驻日参赞黄宗羲故居门楣上的“人境庐”三字即出自其手笔。1885年2月,经总理衙门同意,徐承祖还陆续在日本刊印了自己的著作2种,为父亲徐鼐出版了著作4种,并从日本购回大量古籍善本,现多散佚或存于包括日本、我国台湾地区在内的各地图书馆中。

6. 日语翻译和外交人才的培养。外交官的人事制度是指培养、选拔及规范外交官行为的制度。当时中国并没有相应的外交官制度,且外交官基本上都没有受过专门的训练,并没有太多的外交经验。甲午战前,中国外交事业发展仍处于探索阶段,驻日公使徐承祖的具体探索和实践经验的积累,对后来真正意义上的外交人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其部下罗庚龄、杨锦庭、蔡霖在经历了东通事(第一届公使时代)、学习东文翻译(第二届公使时代)后,地位到徐承祖(第三届驻日公使)任上才得到根本性改变,终于成为正式的日语翻译官,驻日使团日语翻译猛增至六名。卢永铭,童生,受徐承祖提拔,在东文学堂就读时已成为日语翻译,以正式外交官留东京公使馆工作。至徐承祖任上,日语翻译紧缺的困难才最终得以解决。作为近代中国独立培养的第一代日语翻译,陶大均、罗庚龄、陆永铭、刘庆汾等人经过严格训练,不仅能熟练操持日语,且懂外交,善诗文,用实际行动促进了翻译社会地位的提高。他们的出现标志着真正意义上的近代职业翻译官的形成,尽管其事迹大多湮晦甚至失考,但他们在清季日语翻译史上筚路蓝缕的功绩永远不可磨灭。徐承祖期满归国后,卢永铭继续留任服务于第五任驻日公使李经方、第六任驻日公使汪凤藻,活跃在外交舞台上,并译有《陆军教育摘要》一书。刘庆汾,附生,1886年1月5日—1886年9月27日驻东京,之后调至长崎(至1888年1月12日)。徐承祖期满归国后,陶大均、罗庚龄、刘庆汾、杨锦庭均继续留任。其中,陶大均、刘庆汾服役第五任驻日公使李经方、第六任驻日公使汪凤藻。罗庚龄留任至1897年8月21日。刘庆汾1888年1月13日—1894年8月10日在箱馆领事署担任副领事,有《日本国事集览》《日本海陆军制》《日本维新政治汇编辑》等译著存世,其中1889年9月14日—1890年8月25日,以参赞衔东文翻译兼筑地副领事官。

7. 和李鸿章的分歧及相关问题。中日《天津专条》签订后,1885年6月5日,日本外务卿井上馨与驻日公使徐承祖举行了“徐—井会谈”^①,日本希望通过本次会谈,主张由驻日公使遥管朝鲜,并借此打开“巨文岛事件”以来外交上的被动局面。7月2日,奉日本政府之命,日本驻华公使榎本武扬启动了鲜为人知的“第二次天津谈判”,外交大门被直隶总督李鸿章彻底封死。当时中国外交政策实际上由李鸿章所主宰,中日两国完成从朝鲜撤军后,9月6日^②,李鸿章就朝鲜问题的历史、现状和未来,陈述了相关立场和外交政策,驳斥徐承祖,并改派袁世凯再度驻扎朝鲜。不可否认,李鸿章再度派遣袁世凯驻扎朝鲜的十年是导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与李鸿章等人外交

① 详见 P174—177“四月二十三日与日本外部井上馨问答”。

② 详见 P323—326 附录七第4。